

共同体视角下旅游型传统村落乡村性重塑探究

——以湘西地区为例

张兴苗，张家其，喻兴洁

（衡阳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湖南衡阳 421002）

摘要：乡村振兴背景下受旅游要素驱动，传统村落乡村特性出现主动或被动地解构、重构，乡村性作为表征该类村落存在的核心要义，其强化、弱化会加速村落振兴、衰亡。为此亟需对其展开综合探究，积极引导其良性延续、传承，助力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可持续。本文以湖南省西部地区典型传统村落为例，基于共同体理论，根据乡村振兴总要求从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4个层面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性共同体重塑理论框架，以此推动各乡村性要素系统重塑。结果表明：①共同体视角下，旅游型传统村落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乡村要素在乡土空间孕育衍生，随着村落发展不断变革衍化又反馈于乡村性建设，其中生态是基础，经济是支撑，文化是核心，社会是基底，共同推动村落开发和乡村性保护传承。②因自然资源、人文禀赋及旅游资本介入程度不一，该类地区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要素对乡村性重塑的作用强度和方向均不同，致使乡村性表征及演化过程差异显著。③以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为标杆衡量乡村性发展程度，结合区域特性这一核心竞争力，从现状问题、保护对策和建设目标等方面构建旅游型传统村落乡村性重塑实践过程，形成传统村落乡村性保护传承和旅游可持续的一般规律认识。

关键词：共同体理论；旅游驱动；乡村性重塑；传统村落

中图分类号：C912.82；F59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8141（2023）09-1230-09

收稿日期：2022-03-24；**修订日期：**2023-04-19

基金项目：2020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编号：20A061）；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7YJC630211）。

第一作者简介：张兴苗（1998-），女，浙江省温岭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研究。

通讯作者简介：张家其（1986-），男，湖南省醴陵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研究。

0 引言

传统村落有别于一般乡村旅游地，因拥有完整村落景观、独特历史建筑、多样节庆活动、丰富传统文化和奇异习俗信仰吸引了大批游客，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既满足了游客对优美田园风光的追求和传统原生态生活体验，也带动村落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1]。然在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生态环境、景观质量等自然事物属性势必产生变化，自然法则及事物本质也发生着物质化的社会建构[2]，村落传统文化、社会关系、价值信仰等社会文化属性随之重构，致使乡村性不断延伸、演化，或主动、或被动地变迁重塑。考虑到如今乡村性保护和传承已然成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开发的核心要素，更是传统村落现代化建设的

灵魂，如何积极引导乡村性各要素有序重塑也就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回溯传统村落乡村性重塑相关文献发现，在研究内容上，国外研究多集中于空间形态、景观模式、经济生产、社会关系等方面，主要涉及形态特征 [3]、社区模式 [4]、空间建构 [5]、产业结构(6)和社会组织 [7] 等，国内则多聚焦于乡土空间的时空演变 [8]、要素机制更新 [9] 和发展路径探究 [10] 等。研究方法上，传统村落乡土重塑多借用 GIS 地理信息技术对空间要素演变展开时空探究 [11]，或结合乡村性要素内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12]，利用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定性定量相结合等方法 [13] 探究乡村性重塑过程、模式和发展方向 [14]。此外，在重塑路径探究上，众多学者基于乡村性视角，从景观表达 [15]、数字治理 [16]、村落再组织与重构 [17]、政府市场协同作用 [18] 和乡村旅游开发 [19] 等方面探究乡村性保护传承的有效途径，并结合乡土特征因地制宜重塑传统村落乡村性。纵观现有研究发现，已有成果较少对旅游驱动下的传统村落乡村性要素进行全面动态重塑，对各乡村性要素内部和相互间的联动关系未做明确解析，重塑实践过程的科学性、合理性缺乏评判依据。综上，本文结合共同体理论，基于旅游型传统村落的人口、物质、能量、货币、信息等生态流共同作用下推动其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发生整体性演变的事实，对乡村性各要素变迁过程做出清晰阐述，并积极引导其有序、系统重塑，以期推动景观原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升级、文化传承创新、社会和谐发展、旅游可持续开发，推动传统村落实现乡村振兴。

1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传统村落大多地处偏远山区，经济落后，劳动力外流严重，长期受资源、技术、人才制约，产业发展滞后，村落空心化、老龄化现象凸显 [20]，致使传统文化传承中断，传统技艺失传，社会秩序失衡，继而严重制约乡村发展，相当数量的传统村落被社会淘汰走向衰败消亡。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村民及政府为改变村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主动地进行干预，利用其资源丰富性、景观独特性、文化异质性，推动乡村旅游开发，以求开创发展新动力和新业态；另一方面，随着旅游开发深入开展，尤其是城市文化强势介入，村落原有社会文化结构遭到冲击，村落商业化、现代化特征显著，乡村性保护和发展形势日益严峻，这成为旅游浪潮下传统村落发展矛盾的缩影 [21]。

湖南省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湘西地区，本研究选取湘西竹山村、老洞村、惹巴拉、皇都侗和高椅村作为案例地（图 1）。其中，竹山村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和旅游扶贫示范村，老洞村则是中国最原始的历史化古苗寨，两者均在旅游发展中融合了乡土文化，创建的“竹山模式”成为文化旅游扶贫的典范。惹巴拉以独特的“Y”形土家凉亭桥、土家织锦等民族特色吸引着游客，被誉为“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天然博物馆”；皇都侗村的侗寨鼓楼、风雨桥、侗族大歌使其成为侗族民风民俗最为完整的地区；高椅村是湖南省迄今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明清古建筑村落，被誉为是古村旅游的“明珠”。上述村落自然环境优美、地域特色突出、传统文化深厚、历史建筑相对完好、节庆活动丰富、习俗信仰奇异，具备旅游开发的先天优势。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这类特殊村落都希望通过发展旅游摆脱经济落后现状，借此增强文化保护意识、治理生态景观破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但因自身发展基础、企业介入程度、资金投入力度、政府承担的角色功能及村民文化认识、活动参与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上述村落旅游开发方式和效果相差较大，对村落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造成了深刻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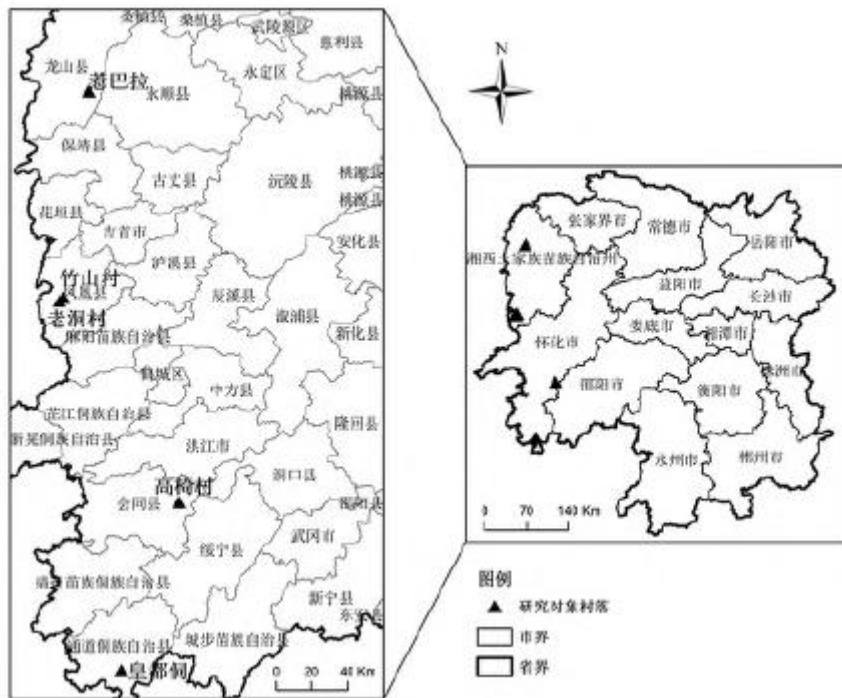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区域

1.2 数据来源

为了探究旅游型传统村落乡村性特征及延续状态，笔者首先通过查阅检索《湖南省统计年鉴》（2021）、湖南省政府资料、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村落历史资料等了解案例村落产业结构、村落保障等基本情况，掌握传统技艺、传统建筑、民风民俗等传统文化保护现状，继而在 2021 年 3 月 30 日—4 月 10 日和 8 月 20—30 日在竹山村（Z）、老洞村（L）、惹巴拉（R）、皇都洞（H）、高椅村（G）开展了两次调研活动，主要采用文献收集法、实地调查法、访谈法等收集了大量一手研究资料。此外，采用滚雪球、半结构化访谈、线上沟通、一对多等访谈方式，对案例村落村民、游客、企业工作人员、政府人员，外来人员等进行访谈，探查村落环境景观质量、文化存续情况、社会交往程度、利益诉求、旅游开发进展等。调研共访谈 100 人，每位受访者访谈时间平均 20—30min，其中村民 29 人编码为 A01—A29，游客 24 人编码为 B01—B24，企业工作人员 13 人编码为 C01—C13，政府基层人员 19 人编码为 D01—D19，外来务工人员 15 人编码为 E01—E15。

2 基于共同体理论的乡村性内涵解析

2.1 传统村落乡村性共同体内涵阐述

“乡村性”一词源于欧洲，意为“之所以成为乡村的条件 [22]”，即乡村的本质属性，其发源于乡土空间中，产生于村民生产生活实践，主要描述乡村空间特征、地域文化与社会属性。随着乡村旅游大热，国内外对旅游语境下的乡村性认知不断深化，其概念内涵不断丰富完善 [23]，从本土所有、社区参与、小规模经营，避免“飞地化” [24] 转变为对传统社会文化特征及乡土空间景观的整合认知 [25]。与此同时，城镇化迅速推进及旅游商业化弱化了农村乡土属性，传统村落乡村特性在时代浪潮中不可避免面临削弱、瓦解。因此，如何在保护与发展大环境下引导乡村性系统性、良性重塑，已然成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重中之重。

“共同体”一词主要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主要指建立在本质意识上的自然结合体 [26]。共同体连接以本能意识、习惯或共同记忆为基础，描述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间相互关联状态，既可理解为血缘、亲缘等关系，也可以是利益牵绊、法律契约等形成的关联。孙九霞将共同体引入乡村旅游地理研究中 [27]，并结合旅游实践提出“旅游体验共同体” [28] 和“后地方共同体 [29]”，表明在旅游驱动下共同体内涵会不断丰富发展而呈现多元化趋势，在此基础上相关学者更是提出“临时共同体” [30] 和“摩梭共同体” [31] 等概念。旅游型传统村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丰富，独具地域性和民族性，承载着主体情感记忆、地方认同、集体认知和社会感知，再加之该类地区旅游开发是涉及资源投入多样、开发主体多元、功能空间叠置、文化价值交融、发展目标融合的繁杂共生现象，故该类村落乡村性共同体内涵不仅包含生产实践活动、物质社会形态，更是指以人为核心，植根于乡土空间自然和人文要素为外部特征的协同共生地域系统 [23]，其重点强调主体自我意识、社会行为和价值信仰，总体概括为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四大层面。基于此，旅游型传统村落乡村性共同体重塑不仅是自然景观保护和历史建筑修复，更是在保持乡村特性前提下，通过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共同塑造，推动乡村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过程。

2.2 传统村落乡村性共同体重塑思路

传统村落山川湖泊、农林草木等生态环境组成的生态共同体为村落发展提供本底资源，村民在此基础上开展实践劳动获得经济效益，进而构建生产方式、耕作模式、产业结构等衍生经济共同体；村落行事礼俗、民间技艺、节庆活动、传统文化表征的文化共同体不断演化、延伸，被赋予特殊价值内涵，进而反哺村落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并构成新型社会关系和组织联系，进而联结成社会共同体，具体表现为文化价值认同、民族精神信仰、伦理道德规范等方面。上述各要素相互影响、互相制约，构成完整的乡村性共同体，当中既包含了基本生活需求，又体现了文化价值追求。传统村落乡村性衍化过程中某一要素或上述某一共同体作用程度过强或过弱都会影响乡村性整体动态平衡，为协调各要素相互作用关系，本研究提出旅游型传统村落乡村性共同体重塑思路表述如下。

传统村落优美生态环境、新奇景观构造、独特空间布局是其赖以生存及旅游发展的基础，但旅游开发过程中仍存在环境修复失真，政府管理缺位等问题，致使其照搬其他村镇陷入千村一面的局势，故需对生态共同体进行全面重塑，以契合乡村振兴生态宜居目标，同时提升生态效益推动产业兴旺。其次，传统村落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该类特殊村落经济重塑是实现产业振兴的重中之重，通过村落多元主体共同作用，全面联结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建构经济共同体，将农业优势贴合旅游需求转化为经济优势 [32]，为村落生态宜居、生活质量改善提供经济基础。此外，传统村落地域特性主要体现为传统建筑、节庆活动、民俗技艺、习俗制度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其存活并依附于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中，并随着生态、经济、社会变迁而瓦解重塑，建构文化共同体既能促进文化保护，激活发展活力，守住旅游核心竞争力，又可深化游客旅游感知，形成情感共鸣，是村落强化传统文化认同及推动旅游高质量、持续性发展的有效途径。最后，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企业、游客、村民等社会团体介入势必会产生多方主体权力博弈，直接或间接影响社会秩序稳定，村民作为村落创造者和物质享有者，其权益需得到保障的诉求与博弈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是目前村落建设的主要矛盾，社会共同体将社会关系、主体权利与乡村旅游相联结，寻求治理结构体系化，维护社会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公平正义，保证村落和谐稳定发展，达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总目标（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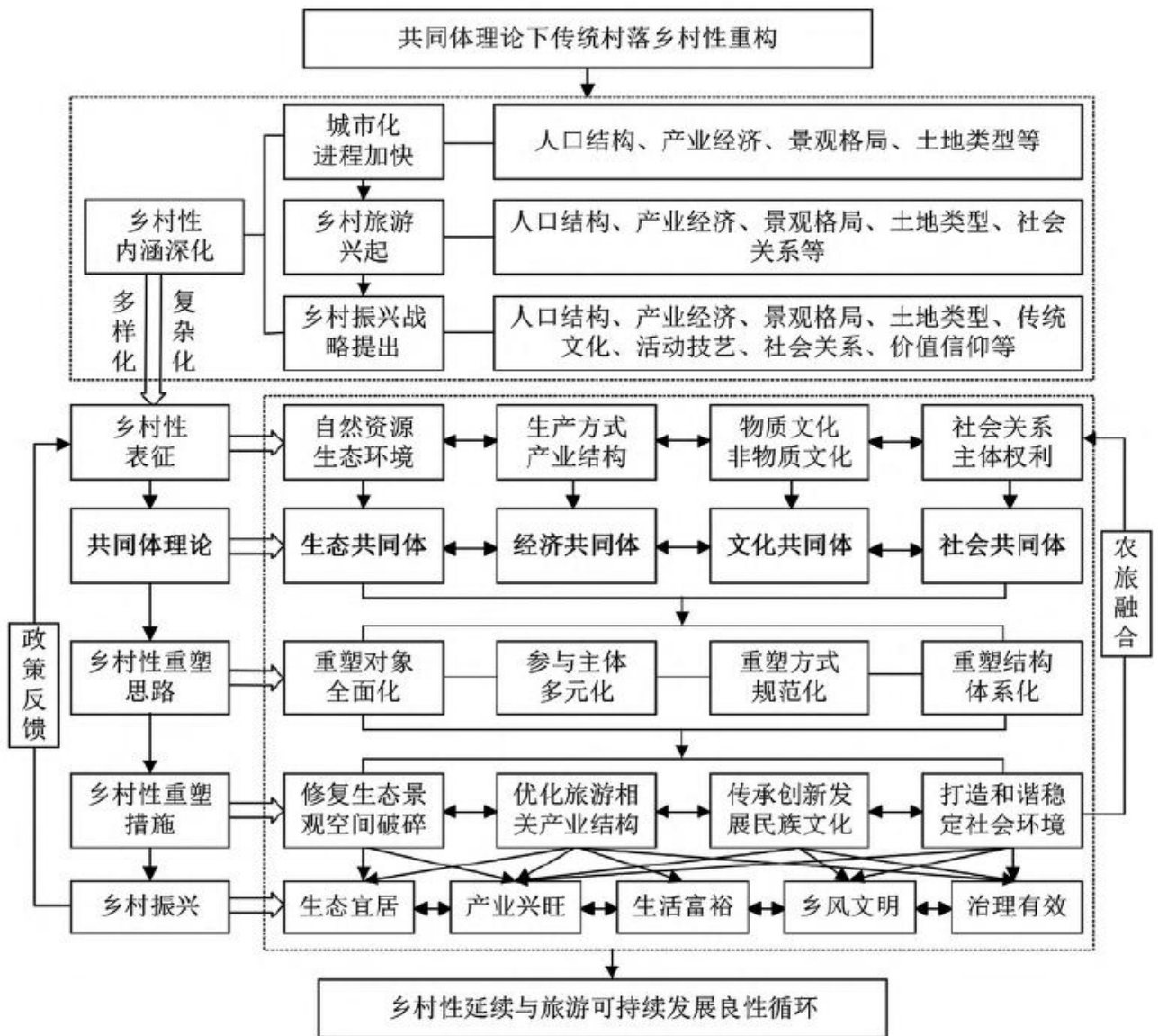


图2 共同体理论下传统村落乡村性重塑体系

3 湘西旅游型传统村落乡村性重塑

3.1 重塑自然环境，巩固物质空间

旅游深度开发对传统村落生态共同体影响日益凸显，如竹山村原生环境优美，自然风光保存完好，为迎合游客回归田园、体验民族风情的喜好更加重视生态保护，村落整体环境质量提升（Z—A01）。同时，竹山村在政府和企业支持下凭借农业优势发展农林果业，通过打造地域特色旅游产品以获取经济效益（Z—A02）。但不恰当的旅游开发模式则会严重破坏原生环境，如高椅村旅游发展初期因政府管理缺位，企业扶持力度不足，再加之受周边商业开发影响，村民环境保护意识不强，街巷杂草丛生，村落整体风貌凋敝坍塌（L—A09），生态效益大打折扣，乡村旅游发展陷入停滞状态，村落乡村性呈现弱化趋势。

旅游型传统村落生态共同体重塑是乡村实现生态宜居的关键 [33]，山川湖泊、农林牧田等生物群落在净化空气、美化环境基础上提供观赏、休闲和游玩等娱乐休憩空间。然而部分村落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生态保护，致使生态景观破碎，阻碍

农业可持续发展，故需制定可行措施以保障生态休憩功能，处理好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保护与发展同等重要原则，提高村民环境保护意识，结合村落原有风格统一规划、修缮生态景观，保持生态属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同时，传

统村落可结合本土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打造乡村品牌，借助生态生产反哺产业发展，为深入推进村落独特景观开发为旅游核心要素提供经济基础，提高旅游吸引力，激活消费潜力（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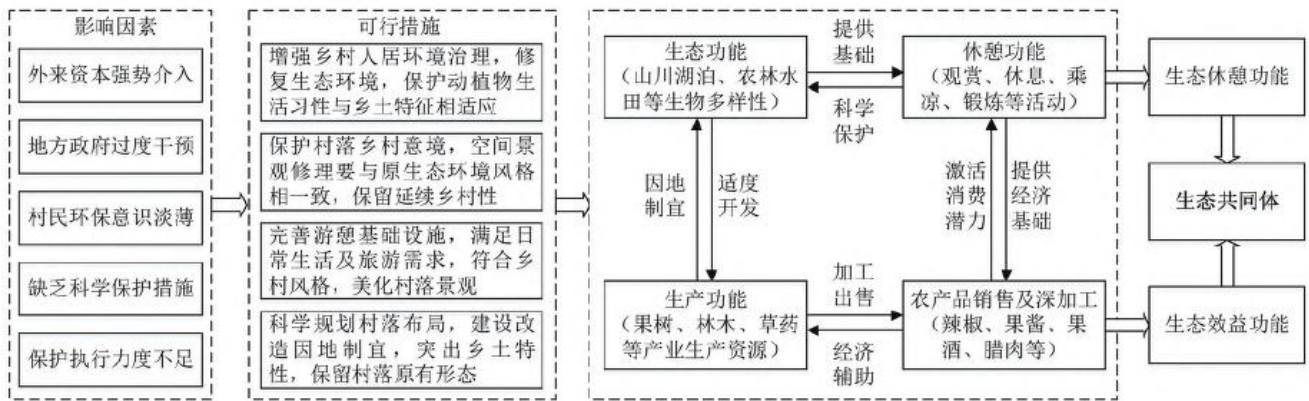


图3 传统村落生态共同体重塑

3.2 重塑产业经济，打造旅游新业态

旅游发展前期，传统村落依赖本底资源和人文禀赋打造民族风情游，但因缺乏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社会资源的投入，旅游产业发展缓慢。例如竹山村为展示文创产品及其制作过程建立生活坊，因村民自身文化认知不足，未能深度挖掘传统文化核心价值，旅游产品仍处于表层展示阶段（Z—E03），传统村落因缺乏竞争力而陷入同质化局面，游客走马观花式参观致使体验感和回流意愿较低（Z—B04）。随着旅游深入发展，皇都侗和惹巴拉等传统村落社会资源投入增加，政府管理经验充足，村民参与村落建设和旅游开发热情高涨（R—A17），新乡贤回归带来先进的思想观念和处事方法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H—A22），在政府引导和企业帮助下，结合本土资源开设农产品加工作坊、农业基地、文创展示销售中心等专门化区域（R—D08），游客沉浸式参观产品产出过程，激发其兴趣和回流意愿（R—B13），进一步推动乡村旅游持续发展。

经济共同体重构是旅游型传统村落乡村性重塑中最活跃的部分，主要包括传统产业改造、产业结构重置、旅游新业态发展等。其中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性重塑的主要途径 [34]，在促进产业转型、提高村民收入和推进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部分村落甚至有意将旅游打造为支柱产业。总体而言，经济共同体重塑不仅要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还需借助传统文化要素从根本上留住乡愁，一方面基于村落旅游资源激活产业经济，开设餐饮、服务、娱乐等多项内容，开创蜡染、民族服饰、果酒等文创产品形成民族标识；另一方面需发挥政府、村民、企业、乡绅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健全财政补贴、产业扶持政策，加大资本、技术投入，挖掘文化底蕴以塑造村落典型意象，实现特色化、专业化生产，重塑乡村经济属性。同时，旅游型传统村落需加强与周边村落间的联系，通过村镇联动实现资源共享，强化地域认同，提高区域整体经济水平，实现共同发展（图4）。

3.3 重塑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精神

传统村落文化是乡村旅游开发的灵魂，乡村旅游是传承、保护、展示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文旅融合模式不仅为文化保护提供了契机，也为村落产业转型升级开拓了新途径 [35]。例如皇都侗村通过传统技艺、节庆活动等渲染文化空间，并运用主客互动模式展示民族风情（H—C10），提升旅游体验质量，加深游客民俗理解与文化认同（H—B18）；同时村落通过整理文献

资料、开设文化学堂、建设民俗博物馆、将传统文化的学习纳入地方课程、邀请文化传承人定期开展传统技艺培训等举措（H—A24），充分展示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性。

传统村落文化共同体内涵主要为传统文化挖掘、保护、传承和创新等方面。旅游型传统村落乡村文化保护、传承要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靠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乡绅、村民等紧密互动，从内容、形式、技术、主体、机制、经济等方面分析乡村性文化保护现存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措施。首先，村落主体要强化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将文化传承融入日常生活，积极参与节庆活动展示民俗风情，增强文化自信；其次，政府完善文化保护相关政策，通过资本引入、税收减免、招商引资等方式吸引企业组织加入，共同推进旅游新业态发展；再者，文化创新要紧扣地域文化特殊性，从生产生活中挖掘传统文化魅力，借助现代技术和新型演绎方式突显文化元素打造旅游产品，强化地域文化特色，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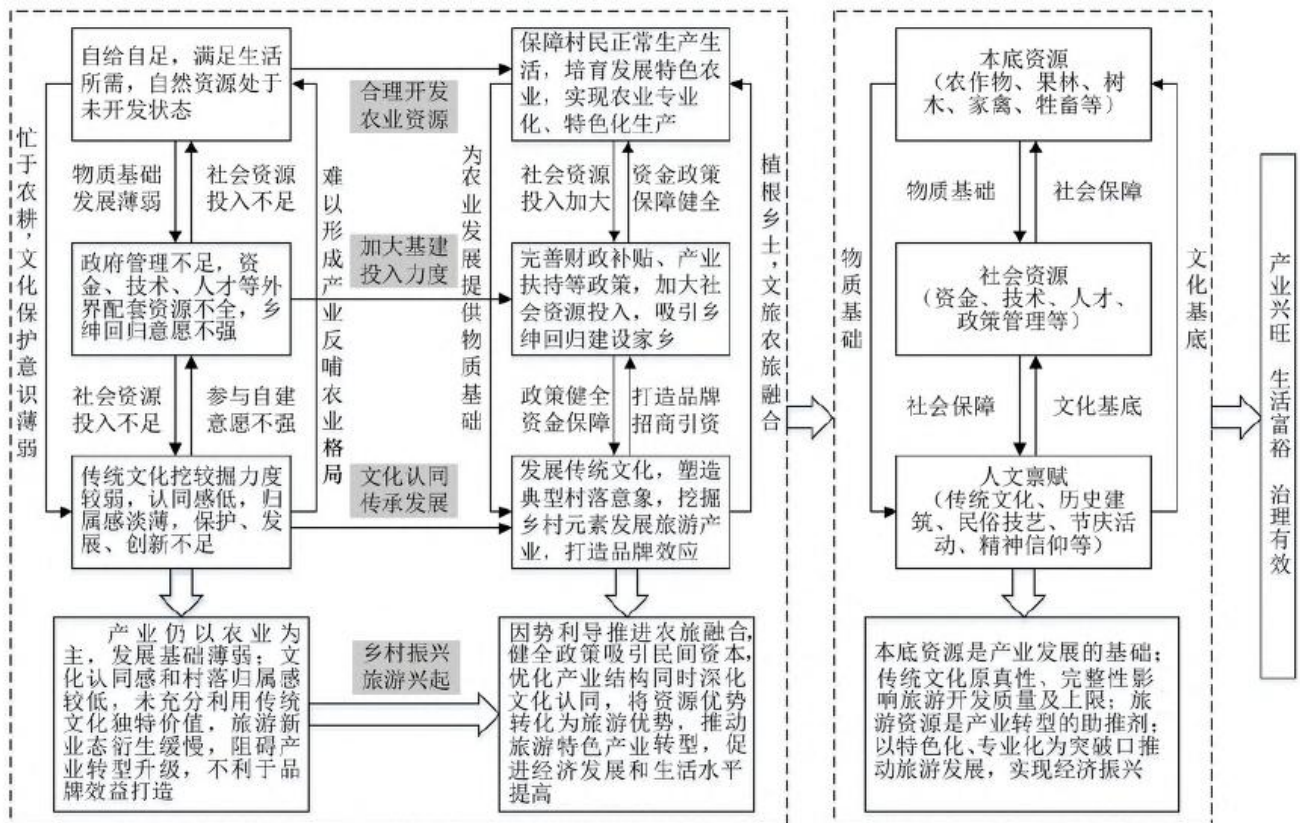


图4 传统村落经济共同体重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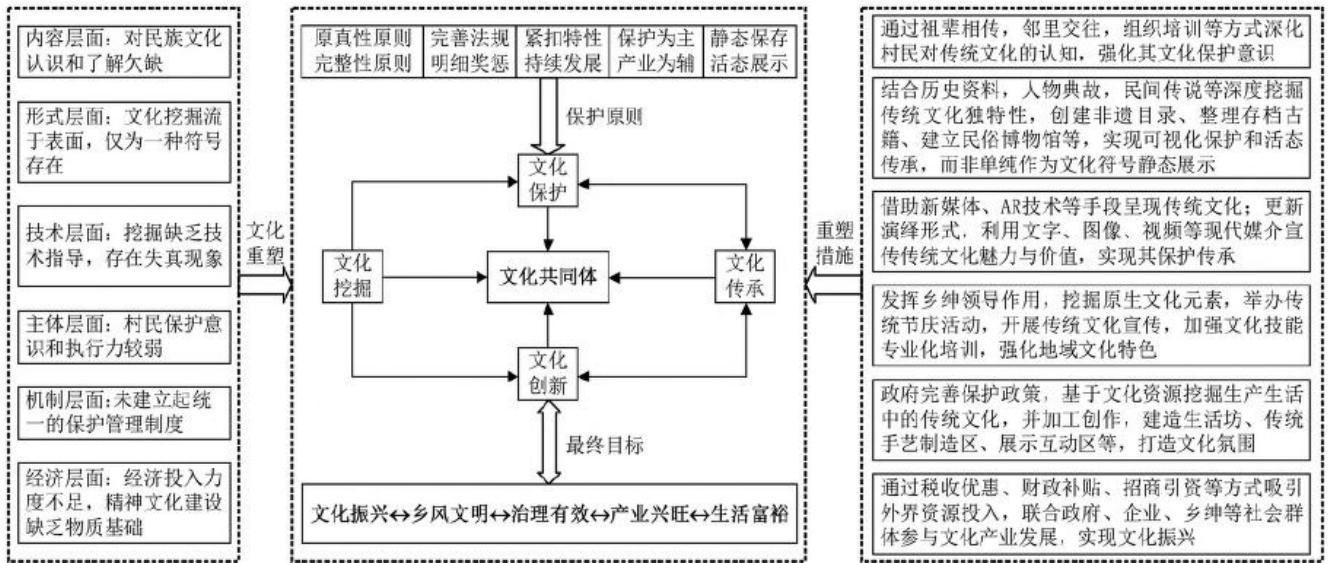


图 5 传统村落文化共同体重塑

3.4 重塑乡村秩序，建构和谐社会

传统村落社会共同体主要为居住在同一聚居地村民共有的精神文化、价值信仰，也是村落凝聚力重要体现。随着旅游介入相关产业衍生，高椅村社会组织关系从原有的氏族血缘关系增添了因产业而形成的业缘关系，村落血缘关系被打破，再加之旅游利益分配决策受资本支配，村民处于劣势地位无法平

等共享旅游红利，甚至基础生活需求得不到保障（G-A28）；其次，村民低权能化严重，自治自建自管权力未真正落实，常年游离在管理决策与规则制定之外，村落建设发展举步维艰（G-D17）。反之，惹巴拉旅游发展较为成熟，通过政府政策支持、企业资金投入技能培训、乡绅乡贤植根文化凝聚共识等方式吸引外出务工人员重返家乡，主动建言献策，合理表达利益诉求，平等共享社会空间（R-D09）。

在社会共同体理论体系中传统村落社会各群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其价值认同趋势从家族认同到地域认同再到命运共同体，天下大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并基于此获得共同满足感。但不合理的开发措施造成该类地区存在开发权利不明晰、价值分配制度不完善、主体诉求无回应、管理体系一体化程度

较弱、社会秩序失衡等问题。基于此，传统村落建设要立足于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根据所有权、经营和管理权三类职能划分，明确各主体权利与义务，厘清自身权责边界，共享旅游资源和红利，在产业优化、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村落建设过程中增强主体归属感，以此构建全面参与的社会共同体，推动村落和谐高质量发展及旅游稳步前进（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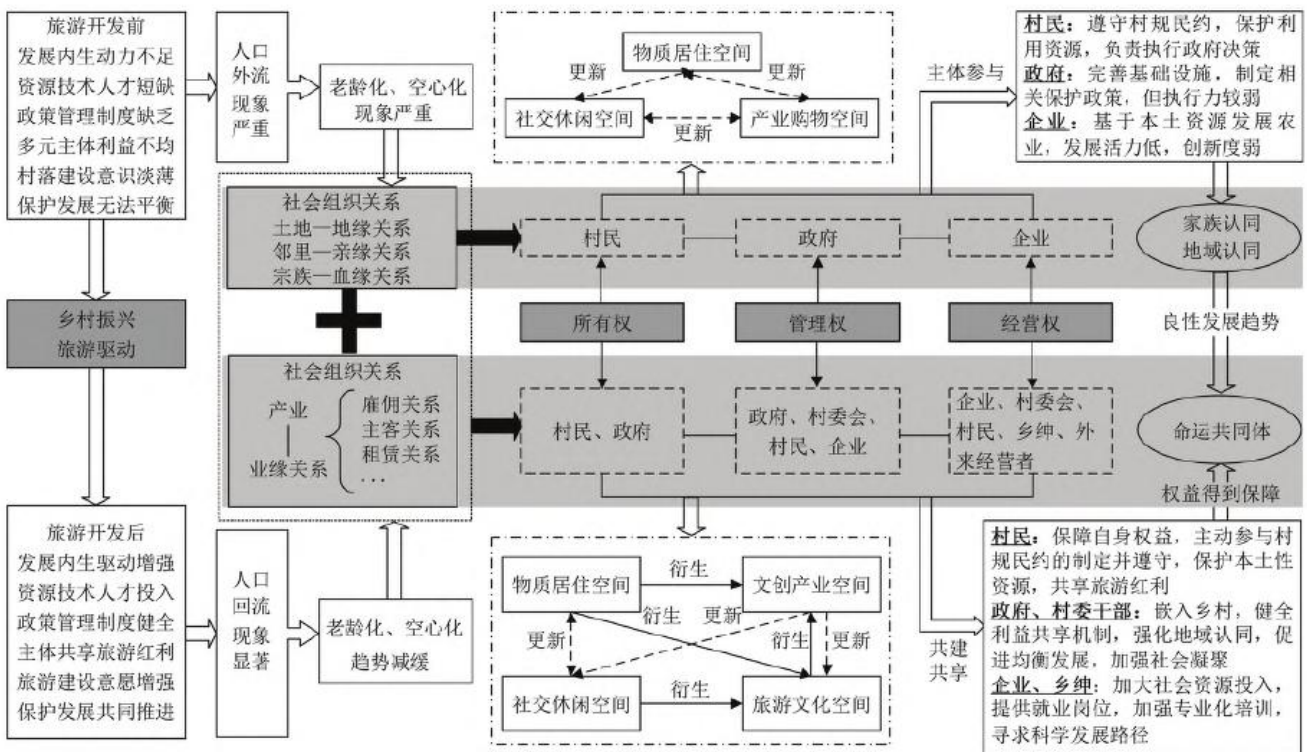


图6 传统村落社会共同体重塑

3.5 紧扣核心特色，联动良性发展

奥格本“文化堕距”理论指出物质文化变迁速度远快于精神文化，在乡村过疏化现象已不可逆情况下，社会之所以认为传统村落乡村性共同体面临崩解，主要基于物质文化角度考虑经济衰退现状，而忽视了非物质文化、民族信仰、习俗礼制等精神文化的凝聚作用[36]。竹山村、惹巴拉、皇都侗等案例村落独特传统文化孕育于乡土空间中并不断衍生、发展，村落旅游开发紧扣乡土文化特征，积极践行生态化、产业化、特色化等原则，开设生活坊、文化博物馆、文创销售等旅游场所（R—E07），优化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以强化旅游核心竞争力，引导游客积极参与节庆活动，体验民俗风情，并凭此作为旅游卖点满足游客回归田园的美好愿望（Z—A05、H—B11），提高村落旅游经济。故旅游开发过程中，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在邻里交往、主客互动甚至整个乡土空间中得到有效整合，推动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唤醒经济活力。基于此，旅游型传统村落乡村性重塑不仅是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单一层面的重塑，更是全要素内部的联动变迁，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面对资本、权力、现代文化等旅游资源强势介入，传统村落乡村性被迫发生改变以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虽其在一定阈值内可实现自我矫正和动态更新，但仍需人为科学引导系统重塑，联合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营造绿色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旅游文化空间，推动以生态为基础，经济为支撑，文化为核心，社会为基底的乡村性要素协同发展，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动态平衡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如何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保护传承乡村特性是本文研究核心议题，其乡村性重塑不仅仅是人口、土地、经济等基本要素简单重构，更是村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关系和主体权利等全方位重塑。本文借助共同体理论，

从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4个层面对传统村落乡村性进行实证探究，梳理该类特殊地区乡村性显现程度和发展现状，探析乡村性重塑过程，据此提出科学合理措施以助推乡村性保护传承和旅游可持续发展协同共生，实现乡村振兴。主要结论如下：①旅游型传统村落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乡村性要素深深植根于乡村土壤中，无法脱离乡土性而单独存在，并在不断解构、重构过程中变迁演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处于乡村性共同体体系中，协同助力乡村性衍化、延伸，推动其良性发展。②旅游型传统村落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要素对乡村性演化作用强度和方向均不同。生态共同体重塑重在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共存，是村落建设发展的基础；经济共同体重塑则是多方资源与利益的优化配置，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以重塑经济新业态，为乡村性其他要素的建构提供物质支撑；文化共同体下的传统文化直根于乡土空间，其蕴含的民族特性、历史内涵、习俗制度是旅游开发核心竞争力；社会共同体作为乡村发展的基底，其重塑为多方管理机制利益博弈，通过更新组织关系带动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以协调各方权益共同推动村落高质量发展。③旅游型传统村落表征的乡村性良莠不齐，故以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来衡量其重塑过程，总结提炼各村落生态、文化、经济和社会等层面现存问题，并紧扣地域特性这一核心竞争力，有针对性地重塑传统村落乡村性，推动各要素协同发展，在助力乡村性传承同时彰显地域特色和历史底蕴，以回应当代社会提高文化自觉发扬文化自信的时代要求。

4.2 讨论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乡村性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不断改革变迁，如何在重塑过程中保护、传承传统文化，彰显乡村特性是该类特殊地区建设开发急需解决的重难点。本文探析传统村落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乡村性要素重塑变迁过程，为打造乡村旅游共同体提供实践参考，为科学制定发展措施奠定理论基础，以期从本质上揭示该类村落乡村性保护与旅游开发协同共生的一般规律，回应乡村振兴战略所提诉求。

然在社会加速发展背景下，一方面旅游开发推动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不断流向乡村促使城乡社会群体间的藩篱被打破，村落乡村性被裹挟着衍化发展更具复杂性；另一方面城市居民返璞归真的美好诉求与村落村民追求现代化公平权益的冲突现象在传统村落表现仍较突出，使得该类村落势必面临功能结构调整和乡村性重塑。此外，传统村落重塑千篇一律的“复刻”无法为村落长期发展提供动力，故仍需立足该类地区传统文化多样性和区域景观独特性，结合政府、企业、村民、社会等多方利益主体诉求，进一步探寻传统村落乡村性动态延续与旅游可持续建设的平衡点，寻求科学合理的发展路径。在此环境下如何重新定义、评价、重塑乡村性具有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也是学术界重要研究主题。

参考文献：

- [1] 董宝玲, 白凯, 陈永红. 多元权力主体实践下民族村寨的旅游空间再生产——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J]. 热带地理, 2022, 42(1) : 87-99.
- [2] 朱竑, 尹铎. 自然的社会建构: 西方人文地理学对自然的再认识[J]. 地理科学, 2017, 37(11): 1609-1616.
- [3] Halfacree K. Ruralspace: Constructing a three-fold architecture[J].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2006, 1(1): 44-62.
- [4] Baylina M, Gunnerud Berg N. Selling the countryside: Representations of rurality in Norway and Spain[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10, 17(3): 277-292.
- [5] Vepsäläinen M, Pitkanen K. Second home countrysid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rural in Finnish popular discours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0, 26(2): 194-204.

-
- [6] Horton J. Producing postmanpat: The popular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idyllic rural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8, 24(4): 389—398.
- [7] Grunewald R A. Tourism and cultural revival[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4): 1004-1021.
- [8] 龚丽钧, 杨忍, 杨帆. 农村土地资本化驱动下珠三角地区乡村经济空间重构历程与重构机制[J]. *经济地理*, 2021, 41(9): 152-161.
- [9] 陈志军, 徐飞雄. 乡村旅游地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机理——以关中地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 42(2): 231-240.
- [10] 席建超, 王首琨, 张瑞英. 旅游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与优化——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J]. *自然资源学报*, 2016, 31(3): 425-435.
- [11] Y Wang, S Yuan, Y Xi.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Hunan Province[J]. *Science Discovery*, 2021, 9(6): 290-296.
- [12] Harrington V, Donoghue D O. Rur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91 :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1981 rurality index[J]. *Sociologia Ruralis*, 1998, 38(2): 178-203.
- [13] 魏鸿雁, 陶卓民, 潘坤友. 基于乡村性感知的乡村旅游地游客忠诚度研究——以南京石塘人家为例[J]. *农业技术经济*, 2014, 33(3): 108-116.
- [14] 陈效萱. 乡村性在乡村旅游中的解析与建构[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1, 32(17): 73-75.
- [15] 朱运海, 曹诗图. 论乡村旅游的乡村性及其景观表达[J]-*湖湘论坛*, 2020, 33(6): 134-143.
- [16] 沈费伟, 陈晓玲. 保持乡村性: 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特色的理论阐述[J]. *电子政务*, 2021, 18(3): 39-48.
- [17] 田毅鹏, 张红阳. 村落转型再生进程中“乡村性”的发现与重写——以浙西 M 村为中心[J]. *学术界*, 2020, 35(7): 61-72.
- [18] 贾未寰, 符刚. 乡村旅游助推新时代乡村振兴: 机理、模式及对策[J]. *农村经济*, 2020, 38(3): 19-25.
- [19] 吉根宝, 郭凌, 王斐, 等. 乡村振兴视角下旅游业态评价与创新机理研究——以江苏省苏南五市为实证调研对象[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19(4): 31-43.
- [20] 戈大专, 龙花楼.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J]. *地理学报*, 2020, 75(6): 1272-1286.
- [21] 洪学婷.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21.
- [22] 龙花楼, 张杏娜. 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国际研究进展及启示[J]. *经济地理*, 2012, 32(8): 1-7.
- [23] 刘敬华. 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概念辨析[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7(11): 38-43.

-
- [24] Brohman J. New directions in tourism for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 23(1): 48-70.
- [25] 何景明, 李立华. 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 [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28(5): 125-128.
- [26] Ferdinand T. *Community and society* [M]. Taylor and Francis, 2017.
- [27] 孙九霞. 共同体视角下的旅游体验新论 [J]. *旅游学刊*, 2019, 34(9): 10-12.
- [28] 苏静, 孙九霞. 共同体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生产主体变迁研究——以岜沙苗寨为例 [J]. *人文地理*, 2018, 33(6): 118-124.
- [29] 孙九霞, 罗靖瑶. 旅游发展与后地方共同体的构建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1(3): 101-108.
- [30] 彭兆荣. 旅游人类学：“临时共同体”的民族志关照 [J]. *旅游学刊*, 2012, 27(10): 5-6.
- [31] 哈斯额尔敦. 地域分布与共同体的形成——以泸沽湖地区旅游开发中的“摩梭化”现象为例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8(4): 70-74.
- [32] 戈大专, 陆玉麒, 孙攀.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 [J]. *地理学报*, 2022, 77(4): 777-794.
- [33] 傅丽华, 谢美, 彭耀辉, 等. 旅游型乡村生态空间演化与重构——以茶陵县卧龙村为例 [J]. *生态学报*, 2021, 41(20): 8052-8062.
- [34] Perkins HC, Mackay M, Espiner S. Putting pinot alongside merino in Cromwell District, Central Otago, New Zealand: Rural ameni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global countryside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5, 39(3): 85-98.
- [35] 陈凤霞.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以鄂尔多斯阿贵庙村为例 [J]. *旅游纵览*, 2020, 34(22): 63-67.
- [36] 安治民, 李文钢, 孙娟. 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少数民族村落共同体重建研究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2, 43(4): 76-81.